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FUWUYE QUDONG CHANGSANJIAO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ZHONG GUO JING JI WEN TI CONG SHU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FUWUYE QUDONG CHANGSANJIAO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刘志彪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ISBN 978-7-300-09387-1

I. 服…

II. 刘…

III. 长江三角洲-服务业-经济发展-研究

IV. 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9475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刘志彪 郑江淮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7.3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学术顾问：洪银兴

主 编：刘志彪 郑江淮

各章撰写人：

- | | | | |
|------|-----|-----|-----|
| 第一章 | 武志伟 | | |
| 第二章 | 付文林 | | |
| 第三章 | 江 静 | | |
| 第四章 | 巫 强 | | |
| 第五章 | 黄繁华 | 唐保庆 | 刘青青 |
| 第六章 | 张二震 | 梁俊伟 | |
| 第七章 | 吴福象 | | |
| 第八章 | 高 波 | 张志鹏 | |
| 第九章 | 高 峰 | 刘志彪 | |
| 第十章 | 孙宁华 | 岳宏伟 | 杨俊林 |
| 第十一章 | 葛 扬 | 完小夏 | |
| 第十二章 | 李晓春 | 梁攀科 | |
| 第十三章 | 尚长风 | 陆利英 | |
| 第十四章 | 余振华 | 赵启安 | 梁东黎 |
| 第十五章 | 汪德华 | | |
| 第十六章 | 魏守华 | | |
| 第十七章 | 郑江淮 | 陈英武 | 高 彬 |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总 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 and 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代序）

刘志彪

一、引言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各个作者从自己的认识的角



度出发分别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

作为本书的序言，我首先来谈谈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选择这个议题，是与我对于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不仅非服务业（初级产业、制造业）的竞争力由服务业决定，而且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对现代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的投入。沿着这条思路，我选择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近年来，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南北贸易”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要不要加入 GVC 的争议，向两个深化的问题发展：一是以什么方式加入 GVC 有利于处于该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二是基于绝大部分加入 GVC 的企业同时也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事实，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同质性竞争的格局，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地攀升 GVC 的高端。

Gereffi (1999) 认为，加入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GVC 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就会自动实现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因为，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及制度体系的学习和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



的 GVC 中，就会尝到快速升级和“自动”实现机制的甜头：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整个生产过程的自主进行→设计自己的产品→在地区或全球市场上销售自主品牌产品。这种乐观的观点受到了 Humphrey 和 Schmitz（2004）等人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在这种 GVC 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进程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于 GVC 的低端环节，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更不存在升级过程中的所谓的“自动”实现机制。Cramer（1999）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被迫从事 GVC 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 OECD 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因此欠发达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残酷的剥削。

这些论点一方面给像中国这类基于国际代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警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价值链的攀升问题，逐步摆脱跨国公司通过 GVC 的治理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控制。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坚持动态主义的方法论，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持续不断地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做法，利用高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现代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 Gereffi 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 GVC 中现代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作用机制和实现途径上。我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



占据 GVC 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非对称的全球利益分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趋向于“软化”。Reeve (2006) 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 OECD 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产品成本的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关注 GVC 中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 GVC 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极其现实和极具理论价值的问题。目前国内文献对 GVC 各个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这个层面。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制造环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所耗用的时间和产生的附加值都是很有限的，与其相关的服务业例如金融、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营销和品牌等活动，才是高附加值的环节。此外，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在加入 GVC 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同时又加入 GVC 的现实发展特征，即加入 GVC 是以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由于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制造环节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因此，关注 GVC 中的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 APS，也是谋求地方产业集群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



二、生产者服务业^①对制造业的投入：攀升 GVC 的作用机理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加拿大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 Guerrieri 等人（2003）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他们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 OECD 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向联系。

尤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中的 APS 的发展，奠定了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 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的，如金融保险、

^① 生产者服务业的英文对应词为 Producer Services，在我国也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本书不作区分。生产者服务是指在商品或其他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企业为企业提供的中间服务，是为进一步生产或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性服务投入。



信息通信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攀升的作用机理，可以从物质、行为、管理和制度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物质投入的层面看，APS 所内含的各种无形的隐含性知识，具体体现为制造业的投入成本^①。（1）这种投入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性能，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中所投入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2）APS 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程度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3）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从企业行为层面看，一般来说，制造商和生产者

^① 这一成本占制造业企业总成本的比例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例如，据我们和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苏州市工业园区、高新区和昆山开发区 60 家外商制造企业（涉及制造业中的十多个行业门类）的部分外商制造企业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外商制造企业中，2001 年和 2002 年生产性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平均为 3.74% 和 3.58%，最低为 1%，最高为 5%。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性服务支出占除原材料以外总成本费用支出的 50%~79%（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较大）。在生产性服务项目中，仓储运输、产品广告、工程技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咨询、邮电信息传输等方面的支出较大。



服务提供商之间是一种“客户—供应商”关系，不仅存在着“邻近”作用，而且 APS 的组织结构影响着制造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同时，制造业的组织结构也影响着生产者服务的供给（Marshall, 1982）。因此从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服务的成本，随着双方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例如，会议的旅行时间和联系的频率等（O'Farrell and Hitchens, 1990）。Coffee 和 Bailly（1991）强调，在发达国家，“中间需求服务生产是潜在的最昂贵的部分，一方面是保持与服务提供商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另一方面是服务的投入和市场成本”。这种推理意味着制造业厂商可以从与生产者服务生产的协同定位行为中获得巨大的好处。Goe（1990）指出，生产者服务厂商也可以从定位于“邻近”制造业厂商的行为中获得大量利益，因为制造业厂商为它们创建了市场。

第三，从当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看，现代制造企业正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则，充分地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在这种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产业升级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的升级。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在全球化和外包条件下，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在当代企业管理模式中，努力实现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把自己所不擅长的或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由相关的专业外包公司提供更加专业、优良的服务，这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生产者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



“推拉效应”，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使得这些地区在知识溢出、劳动力质量、环境设施的方面将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成为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选择区域，最终形成双赢的局面。

第四，从良性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APS既是制造企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又为制造企业创造了新的适宜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高级生产者服务体现为制造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① 当地方性产业集群具备优良的生产者服务条件时，即生产者服务显示的交易成本低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时，企业的部分业务就会外包出去。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促使了互联网络步入成熟阶段，导致了信息以及通信成本的下降，这样就减少了企业从市场上获得服务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采取外包行为。制造业企业通过外购，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公司内部零件和服务生产者缺乏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企业采取商务活动外包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迂回化和柔性化，在生产的一个个阶段，都需要相关领域专家来进行计划、控制、评估等工作，才能使生产有效率地进行。随着金融、咨询、法律、工程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日益专业化，其专业化的程度使得规模再大的制造企业也无法在其内部独自提供这些知识。科技进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给生产者服务业以极大的发

^① 不难理解的事实是，诸如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物流服务等生产者服务，均是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



展空间。

换句话说，APS 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当于波特竞争理论（Porter，1998）中所说的专业化的“高级要素”，它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 GVC 下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三、攀升 GVC 需要寻求 APS 嵌入制造业的实现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出口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也十分引人注目。1980—2006 年间，中国货物出口量以年平均 25.66% 的速度增长，超过世界同期货物出口平均增长速度 18.32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 27%。^① 这其中，1993—2002 年的 10 年间，出口额从 917.6 亿美元急剧上升到 3 255.7 亿美元，增长了 2.55 倍，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从 15.3% 上升到 26.3%，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5% 上升到 5.1%；2003—2006 年，出口额分别达到 4 382 亿美元、5 933 亿美元、7 619 亿美元和 9 689 亿美元，年平均出口增速达到 31.4%。^② 我们认为，这种骄人的业绩的取得，主要利用的是低级要素投入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投入“高级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

^① 以上数据皆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资料整理算得。

^② 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fdi.mofcom.gov.cn/aarticle/at/200710/20071005159925.html>。



这个结论在我们最近所做的一项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① 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有效地控制了行业和地域因素后，产品内分工、企业规模、企业区位等传统要素，对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有正向作用，而经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等高级要素，并未成为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制度因素对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扩张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方面。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主要基于集聚效应所带来多因素的融合作用。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企业总的来说被压制在或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影响了出口能力的持续提升。

这个来自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充分说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低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和专业化要素（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在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现实的嵌入机制，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现实中，现代的高级要素难以嵌入中国制造业并由此形成制造企业竞争力，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赫克歇尔和俄林（H-O）新古典理论提出的要素禀赋差异对国家间专业化分工具有决定作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整体上可能仍然适用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依靠低成本劳

^① 参见刘志彪、张杰：《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的决定——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2007。



动力要素禀赋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因此，利用高级要素投入提升产业竞争力，需要密切结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高级要素投入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现实的产业竞争力，相反更有可能偏离国家的比较优势，扭曲现实的发展进程，因大量消费资源而起到消极作用。对此需要思考的是，长期局限于低级要素的投入，容易使中国企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①。因此，问题的本质就不是要不要注重高级要素投入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发展条件约束下，如何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既取得现实的贸易利益，促进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又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实现产业升级目标。这就需要寻找符合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现实可行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

第二，从我们对中国实践的观察看，目前中国多数本土企业并不追求依靠高级要素投入来构建高端竞争能力，而是竞相追逐以代工等方式切入到由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所主导的 GVC 分工体系，并且基本上都切入到 GVC 的低端制造或加工组装环节。当参与 GVC 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一旦试图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就对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形成挑战。作为 GVC 分工体系中的发包者，它们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我国企业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迫使我国企业被“锁定”或“俘获”于

^①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以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